

牢记总书记嘱托 讲好云南红色故事

敢抗横流不惜身 千秋不朽是精神

——民主斗士闻一多舍生取义的一生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理论学习中心组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
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
你是一团火，照亮了古代；
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
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
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朱自清·《挽一多先生》

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街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作为多年同事与挚友的朱自清闻讯后，怀着悲愤交加的心情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挽一多先生》，极力颂扬闻一多由爱国诗人到学术大师而最终成为民主斗士舍生取义的光辉人生。闻一多确是一团火，这团火，既照亮了自己披荆斩棘，向前进的道路，也照亮了无数青年奋勇前进的道路。

爱国诗人

“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闻一多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他热爱祖国五千年的文化，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家国情怀在他的血液里一直澎湃地流淌。1899年，闻一多出生在湖北浠水的巴河镇一户“世家望族”，喜好爱好古典诗词歌赋和美术。1922年7月起，闻一多先后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攻读美术专业，曾获得最优名誉奖。期间，他与罗隆基、吴泽霖等一些志同道合的清华校友参与创办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传扬“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1922年8月，他在致父母的信中写道：“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墨所能形容……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国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总之，彼之蔑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为此他感慨不已：“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忍！”1923年9月，记录闻一多成长过程的诗集《红烛》在知己梁实秋的鼎力相助下问世了，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他在国外创作的《孤雁》《太阳吟》《忆菊》等一批充满爱国思乡的诗篇。

1925年，帝国主义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刚刚归国不久的闻一多按捺不住内心的悲愤，先后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醒呀！》《七子之歌》《爱国的心》《我是中国人》等诗，希望“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在《醒呀！》中，他控诉帝国主义如虎豹豺狼糟蹋神州的可耻行径，呼唤“熟睡的神狮”快快醒来；在《七子之歌》中，他将帝国主义列强霸占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等七个地方，比作离开母亲怀抱，饱受异族统治者欺凌虐待的七个儿女，抒写了他们“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1928年1月，凝聚他多年来呕心沥血的理

论探索与创作实践的诗集《死水》出版，歌颂对于祖国历史文化的挚爱，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朱自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说闻一多：“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1943年在《新诗杂话·爱国诗》中又说：“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

学术大家

“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闻一多是一位以特殊学术个性和贡献跻身于屈指可数的近代大师之列的人物，他以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巨大成就，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在《唐诗》《诗经》《楚辞》《庄子》以及中国神话等多种学科研究中，闻一多都有精深的造诣，取得了开拓性、独创性、突破性、超越性的研究成果，代表性著作如《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楚辞校补》等，堪称经典之作。

从1927年到1937年，闻一多先后在上海政治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从教，开始了从诗人到学者的蜕变，此后近二十个年头，他埋头苦干，废寝忘食，全副精力从事研究和教学。在青岛大学，他教授的是名著选读，中国文学史、唐诗和英诗入门等充满学术味、诗味和有独到见解的课程，并以此投入《诗经》等研究考证中。在清华大学，他潜心治学，先后研究了《唐诗》《楚辞》《周易》，整理资料，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论著，为中华文化事业的存续繁荣增添了不朽的一笔。

闻一多治学严谨，涉及范围甚广，从诗跨到史，从文学跨到哲学，学科领域众多，他以传统学问为根基，而又眼光敏锐，能突破旧的思维模式，吸收当时最新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进行研究，极大地拓宽了学术研究的广度及深度。比如，为正确理解《诗经》所反映的时代的人民生活及思想感情，他注意寻找现实生活与《诗经》时代文化状态略同的有关材料来加以印证；为写《杜甫》传记，他先后收集了与杜甫交往过的360余人的资料；研究《周易》，他在考据的同时也采用社会学的方法，为《周易》注入了新的立意。

郭沫若在《闻一多的治学精神》中提到，闻一多无论在做人还是做学问方面的态度，都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模范，尤其佩服他那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彻底，功夫的深厚，考证的精确，见闻的超拔。

民主斗士

“从不问政治到问政治，从无党无派到有党有派，这一转变，从客观环境说，是时代的逼迫，从主观认识说，是思想的觉悟。”在那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时代中，历史的浪潮将闻一多这些知识分子推向风口浪尖，在改变着自己的人生轨迹的同时，也不断寻觅着个人的初心，而他能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了解做出政治上的严肃选择。

1943年8月的一天，闻一多偶然得到了一本解放区诗人田间的诗集，仔细看过以后，觉得这些街头诗质朴、干脆、简单、坚实，如同一声声的鼓点，响亮而沉重，打在他的心上。他将这种感受也带进了西南联大的课堂：“抗战六年来，我生活在历史里、古书堆里，实在非常惭愧。但今天是鼓的时代，我现在才发现了田间，听到了鼓的声音，我感到非常感动。”尽管当时的西南联大提倡学术自由，但还没有教授在课堂上公开讲中国共产党，因而闻一多的这堂课在沉寂的校园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有人议论说“这听鼓的诗人将要变成擂鼓的诗人。”接着，他又专门为《生活日报》周年纪念刊撰写了一篇你们意想不到的稿子”——《时代的鼓手》，文中指出：“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

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时代的鼓手》是闻一多思想转变时期发出的一声强有力呐喊。

1944年5月8日，他在西南联大国文学术会召开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学运动”文艺晚会上强调：“要把文学和政治打成一片”“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6月25日，他在《云南日报》又发表更加尖锐的《可怕的冷静》，批评躲在象牙塔中不愿过问国事的学人，说道：“时机太危急了，这不是冷静的时候，希望老年人中年人的步调能与青年齐一，早点促成胜利的来临！”

此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已经派干部来昆明，协同地下党组织，在抓紧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工作的同时，加强对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工作，从受邀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开始，闻一多和共产党之间就建立了较为经常的联系，互通情况，交换意见。闻一多通过联系，从漫漫长夜中看到了曙光，感到党的关怀，受到极大的鼓舞，有力地促进了思想的转化。党通过闻一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闻一多有许多事情也主动要求党的支持和帮助，尊重党的意见。他积极性很高，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反复学习《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等党的文献，认真阅读《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还积极推动别人学习。随着同党的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如火如荼的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他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进展日益加快和日益深化。

1944年秋季的一天晚上，已经是民盟盟员的吴晗正式约请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经过慎重思考，他发自肺腑地说：“国事危急，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只要是来救火，不管什么人都是一样，都可以共事。”几天后，闻一多秘密加入了民盟，宣誓“为民主前途奋斗”，并表示自己“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闻一多向旧的生活告别了，开始汇入民主运动的洪流，并为民主不倦地斗争。

舍生取义

“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闻一多在四十多年漫长曲折的道路上，经过长期摸索、反复思考和饱尝苦痛经验之后开始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和鼓励下，找到了获得新生的大道。从唯美主义的新月派诗人转变为英勇的民主斗士，在一系列严峻的实际斗争中的合作，关系日趋紧密，战斗友谊日益深化，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风雨同舟、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战友。

民主斗士的身份，是闻一多生命中的最强音。从1944年参加西南联大“五四”纪念座谈会开始，到1946年7月15日英勇牺牲，闻一多带着从心底迸发出的热情和正义感，把自己像火山爆发一样地献给真理，献给民主运动。他走出书斋，以昆明这个“民主堡垒”的中坚分子的姿态和勇敢斗争的精神，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政治活动，撰写社论、起草宣言，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鼓舞人民群众的战斗热情。1944年10月10日，他在昆明各界双十纪念大会上发出洪亮声音：“要记住昆明在国际上‘民主堡垒’的美誉，我们从今更要努力发扬民主自由的精神！”12月25日，他在昆明各界护国起义纪念大会上喊口号：“我们相信人民的力量是更强大了，让我们就从昆明开始。继承护国精神，扩大民主运动，争取更大的胜利！”1945年5月4日，他在“五四”纪念活动上大声疾呼：“‘五四’过去二十六年了，我们大半个国家还在受苦受难。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此时的闻一多，面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倒行逆施，挑动内战的阴谋，更是义愤填膺，斗志昂扬，奔

走呼号，忘我工作，往往站在斗争的前列，哪里需要就赶到哪里，有力地抨击敌人，鼓舞士气。1946年6月26日至29日，闻一多在民盟云南省支部连续举行的招待会上号召大家：“我们并愿意以这支满是粉笔灰、毫无血腥气的手去扭转中国的历史，去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今天我们站出来，要明是非，辨真伪，要以民主为准绳。……只有把全国爱和平民主的力量团结起来，中国的进步才有希望。”

李公仆遇刺逝世后，有人劝闻一多小心谨慎，但他已置生死于度外，锁定自如地参加李公仆殉难经过报告会，义愤填膺地走上去讲台……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这是血与火铸就的钢铁般的语言，具有巨大威力，不仅在当时震撼了千万人的心弦，而且成为中国革命史上闪光的格言！唐登眠在《回忆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中写道：“闻先生的演讲激昂慷慨，人们屏息静听，至公堂静得只闻先生洪亮的声音载着烈火一样的语言在回响，或者就是暴风雨般的掌声震撼屋宇。整个气氛简直使那些混迹其间的特务分子无容身之地。”

闻一多用自己的生命，吹响了埋葬旧世界冲锋号的一个音符。革命实践家、诗人张子斋曾用三首七绝表达对这位著名诗人和杰出战士人品人格的怀念和敬仰之情，其中“敢抗横流不惜身，千秋不朽是精神”的诗句高度评价了闻一多以身殉志的崇高精神和视死如归的生死观。2009年，闻一多当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60位为解放云南作出突出贡献人物”。

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

闻一多坚贞不屈、舍生取义的高尚品质和精神风范，是历久弥新、永续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闪耀在云南历史上的辉煌篇章。新征程上，我们要从他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英勇事迹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在践行初心使命中砥砺奋进前行。

汲取“爱国奉献”之力。努力践行“国之大者”，急国家之所想、应国家之所需，始终对祖国的发展保持高度关注和行动自觉，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伟业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奋勇争先、更加出彩。

汲取“实干奋斗”之力。自觉增强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大力涵养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直面矛盾和问题，实干苦干，接续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

汲取“敢于斗争”之力。继续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坚定进行伟大斗争的意志，增强斗争本领，主动迎战、勇于斗争，不断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斗争中积累经验，在斗争中成长提高。



1940年，联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北郊大普吉镇合影，左起为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闻一多像

“一二·一”运动中的闻一多

他始终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有力地支持这场正义斗争

黄治元



1945年“五四”纪念会上闻一多发表演说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的墨迹尚未干透，蒋介石集团就公然翻悔，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掀起反内战游行集会活动。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事讲演会，由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4位教授演讲时，呼吁制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军警特务对晚会进行破坏，在校舍围墙外向会场开枪、放炮，爆炸手榴弹，扰乱会场，恐吓群众。

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学生自治会立刻决定罢课抗议，西南联大教授会也一致通过对当局的抗议书，提出“此不法之举，不特妨害人民正当之自由，侵犯学府之尊严，抑且引起社会莫大之不安”，要求必须立即制止。但是，云南当局于12月1日指使数百名武装特务冲进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血

腥镇压学生运动，杀害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和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制造了“一二·一”惨案，震惊全国。

面对惨绝人寰的屠杀，闻一多愤怒到极点，不知道还有什么语言可以描述反动派的暴虐，他说，这次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暴行，简直是黑色恐怖。当年，“三·一八”惨案只是发生在执政政府门前，而现在则是几百军人在学校，在最高学府内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

在这次运动中，闻一多始终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积极组织教授罢课，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有力地支持这场正义斗争。他在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中指出：“‘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就是这一天，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

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这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惫的人都振作起来，每一个反动者都战栗地倒下去！”

为了促使“一二·一”惨案得到合理解决，闻一多还与主持西南联大常务工作的梅贻琦恳谈4个小时，细说了惨案发生前后的具体情况，以及学生对惨案的正义立场与要求，使他支持学生的立场，为运动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他在起草《告同学书》《告诉状》以及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惨案真相等事宜上也尽到了最大努力。

1946年3月17日，昆明学联为四烈士举行庄严的公葬仪式。上午11时，三万多人组成的出殡队伍出发了，各界民

众举着“民主使徒”“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的大标语牌，在“自由钟”的引导下，行进在市区主要街道上。闻一多在长达6个小时的出殡过程中，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队伍，回到西南联大新校舍四烈士的墓地，已经是下午5时许。墓后大理石壁上，刻着闻一多用小篆写的“四烈士之墓”，《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也刻在墓壁上。公葬典礼上，闻一多沉痛地说：“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但是我们的路还遥远得很。……今天我们在死者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本版图片均由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提供